

以“一带一路”建设 重塑全球价值链

□黄先海 □余 骁

(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7)

以“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为契机构建以中国为核心枢纽的双向“嵌套型”全球价值链分工新体系是新时期我国突破“俘获式困境”、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分析表明,发达国家与我国在经济发展上的相互需求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对区域内协同发展的迫切诉求使得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双向“嵌套型”价值环流、重塑现有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成为可能,且我国完全具备成为新型分工体系中核心枢纽环节的基础。在结构体系、运行机制、服务对象以及竞争模式等方面新型价值链分工体系虽有别于现有全球价值链,但双向需求下的“嵌套型”结构使得两者既相互制衡又互为补充。本文进一步指出新型分工体系将从环节专精、链条广延和网络纵深三个维度提升我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最后提出部分政策建议。

关键词: 一带一路; 全球价值链; 国际产能合作; 新分工体系; 提升路径

中图分类号: F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656(2017)03—0032—08

引言

后危机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加速了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 GVC)在世界范围内的深化,中间投入产品的可贸易性、生产分工环节的可分解性、资源要素配置的可扩散性日益提升,越来越趋于碎片化的全球价值链增值环节也日趋增多^[1]。由于对分工参与国的资源和技术禀赋要求较低,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国际分工中来分享全球化红利。但从全球价值链的利润分配结构看,由于产品研发、关键零件生产及市场营销这些高利润环节被发达国家牢牢占据,而一般零部件的生产和加工等低利润及中游环节则基本落脚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容易利用其核心能力来约束发展中经济体企业的知识创造与企业能力提升,使发展中国家陷入长期的“低端锁定”困境^[2]。这种“嵌入式困境”导致发展中国家只能通过承接低端转移产业进行“等距离”发展,导致其承接落后而在市场、技术两方面落入双重追赶的两难境地^①。与此同时在对金融危机期间由于制造业空心化导致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总结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出台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全球生产网络、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外贸竞争力提升研究”(15ZDB156);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加快要素自由流动的对外贸易战略转型研究”(14AZD056); 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开发开放研究科技联盟、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资助项目“一带一路与中国自贸区建设”(16CAWRD02)

^① 诚然在现有全球价值链中,后进国家可通过技术模仿实现一定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但该模式并不可持续,因为后进国难以在前向联系上脱离国际市场尤其是发达国家市场,同时在后向联系上也难以摆脱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资金的依赖,导致后发国家始终与发达国家保持一定技术距离而难以实现赶超。

制造业回流政策,如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欧洲的“2020 战略”、日本的“重生战略”等都力图在市场、资源、人才、技术、规则、标准等方面的竞争中夺得一席之地,甚至主导权。这意味着在新时期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时将面临发达国家“高端回流”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低端分流”的双重竞争。

一、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构建双向“嵌套型”全球价值链分工新体系

后危机时期,国际经贸格局的重大变革导致我国利用传统优势继续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扩展空间越来越小,如何通过转变国际分工嵌入模式形成新的对外贸易竞争力,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比较优势陷阱”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焦点。以“一带一路”建设^①主导区域经济一体化或将是我国在新时期转移国内过剩产能、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国际分工地位提升的重要途径。

基于一国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的跨国公司区位选择引致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形成,而第三次产业转移浪潮^②奠定了“先发国家居于两头、后发国家落脚底部”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投资带动增长的模式以及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转型,中国制造业自2010年起就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2012年中国工业有22个行业产能相对过剩,过剩率达80%以上,尤其是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行业^③。同时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升使得这些产业亟待通过“走出去”来化解过剩产能。借“一带一路”建设加速第四次产业转移浪潮^④形成新型全球价值环流将有可能成为中国及各沿线发展中国家突破“低端锁定”困境、避免“高低挤压”竞争、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所在。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要素成本与比较优势各不相同,各自所处发展阶段也不尽相同,因此通过共建“一带一路”重构经济地理、推进投资便利化进程、扩大中国与沿线各国在不同行业及特定行业上下游间的投资范围,将为中国与沿线国家进行国际产能合作与产业结构优化提供全新平台^④。基于此,我国可以顺应比较优势规律将部分低端、过剩产业(区段)和过剩产能通过国际产能合作的形式梯度转移到处于较低经济发展水平的沿线国家,实现自身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同时,构建以中国为核心主导的“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分工体系^⑤,并整体嵌入到现今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形成双向“嵌套型”全球价值链分工新体系(如图1所示),实现从发达国家引领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为中国引领其他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转变。具有经济发展基础与技术积累优势的中国作为核心枢纽国将起到“承高起低”的关键作用,并将当前低端的“外部依赖”型嵌入模式转变成中高端的“核心枢纽”型嵌入模式,这是新一轮全球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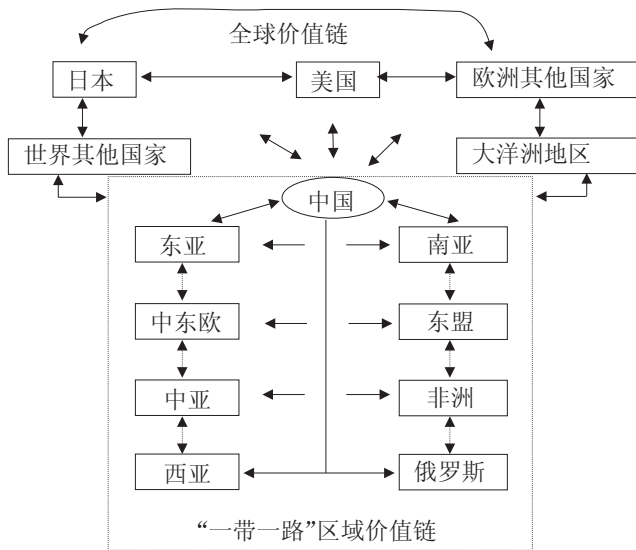


图1 双向“嵌套型”全球价值链分工新体系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相关文献整理而得。

①“一带一路”(全称“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于2015年3月28日由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经国务院授权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正式提出并作系统阐述。

②即指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以及“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作为输出国将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至中国、东盟等发展中及转型期经济体的过程(刘友金和胡黎明^[5])。

③本文在相关研究基础上,将危机后兴起的以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主要输出国的产业转移浪潮定义为“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

④Pomfret & Sourdin^[6]指出区域价值链的构建并不要求沿线国家放弃现有的全球需求与市场份额,两者本身互不相斥而相互促进。

条件下我国寻求与世界经济“再平衡”的绝佳机遇,也是实现我国及沿线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地位提升的必由之路。

较早参与全球化进程所积累的经济、技术基础使中国实现了向较高附加值环节的快速攀升^[7],因此我国已经具备足够的能力和基础成为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中的核心枢纽国,在功能上对外承接、转化、应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与产品、对内主导“一带一路”区域经济一体化(虚线框内所示),而沿线各国又通过与中国开展分工合作参与到区域价值链中,实现自身经济的增长。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与各沿线国家在合作领域、合作重点、合作机制和合作内容等方面均存在差异,且部分沿线国家间长期存在的复杂对立关系(如长期敌对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及近年爆发过激烈冲突的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都导致短期内“一带一路”上的沿线国家倾向于单独与中国产生联系,呈现出多重双边伙伴关系^①。这种特殊的经贸合作关系使中国与沿线成员国间形成了独特的“轮轴-轮辐”型架构的区域分工体系,具有经济技术优势的中国成为其中的“领雁国”带领沿线各国实现经济前行^②。另一方面,这一经济循环系统虽相对独立,但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要构成这一特征使该体系在国际市场、技术和资金等方面无法完全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赖;而后危机时代西方发达国家普遍低迷的经济增长态势又凸显出这些国家对中国及沿线后发国家广阔市场的重视^③。这种双向需求关系不仅拓展了原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内涵(现有体系主要为单向控制关系),还能基于中国的全球性经贸影响力让沿线各国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更多规则制定、产品定价等方面的话语权,在避免陷入“俘获式困境”的同时与先发达国家间实现良性公平的竞争与合作。这种特殊的内外部联系使中国必然成为新型分工体系中的核心枢纽环节,同时“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也不可能游离于全球价值链之外而独善其身,这正是理解新分工体系中“双向”和“嵌套”这一特殊结构的关键所在。正如张良悦和刘东(2015)^[8]所指出的,要将包容性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结合起来,才能有力地支持对外经济开放质量的全面提升。

二、新型分工体系的支撑基础及其体系创新

(一)中国的核心枢纽地位

在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得益于国内改革持续推进和经济开放日益深化,中国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目前我国已完全具备构建自身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基础,这主要体现在我国近十年在经济总量、对外贸易与投资和技术创新这几个重点领域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绩(见表1)。

1. 经济总量

从表1的结果来看,作为目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体量几乎占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一半(2015年达48.6%),具有绝对的经济话语权,且GDP增速长期保持在8%左右,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将是我国建立自身主导的新型价值链分工体系的有力保障。

2. 贸易往来

作为目前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我国的贸易总量占沿线国家总量的比重从2006年的不到25%飙升至2015年的近40%,占世界贸易总量的比重也超过12%,这为我国进一步与沿线各国在贸易往来尤其是互补性贸易方面展开合作铺就了良好基础。

3. 对外投资

^①为清晰表述这种特殊关系,在图1中我们用实线表征各沿线成员国与中国的直接联系,以虚线表示除中国外其他沿线各国间的联系。

^②中国虽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的“轮轴”国,但该分工体系两端的关系本质上仍是互补,而非绝对的控制与被控制。

^③魏浩^[9]指出,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在其各类商品出口中的份额一直呈稳步提升的态势。而在亚投行创始成员国资格确认截止日期前夕,英、德、意、法等西方发达国家的陆续加入均说明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市场的重视与依赖。

表1 近10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世界经济的影响 (单位:%)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生产总值										
占沿线国家比重	28.12	28.95	31.02	35.63	35.91	37.31	39.28	41.35	43.72	48.59
占世界比重	5.39	6.17	7.30	8.54	9.28	10.38	11.46	12.52	13.54	15.30
对外贸易										
占沿线国家比重	24.83	25.70	25.04	26.96	28.26	28.76	29.57	31.36	32.76	39.83
占世界比重	6.31	6.87	7.18	7.67	8.44	9.00	9.60	10.24	10.77	12.33
跨境投资										
占沿线国家比重 (流入量)	27.71	25.33	26.18	31.62	40.84	45.16	40.83	46.44	44.98	45.93
占沿线国家比重 (流出量)	12.94	5.78	17.71	23.19	22.48	19.02	26.45	24.87	34.52	53.33
专利使用										
占沿线国家比重 (专利费收入)	7.02	8.53	9.22	7.47	11.84	8.94	11.36	8.64	6.11	11.64
占沿线国家比重 (专利费支出)	22.34	23.25	21.64	24.72	24.05	24.29	25.82	27.66	30.16	36.25

注:1. 所有计算结果的原始数据均以当年美元价计;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以包括中国在内的65个沿线国家数据加总而得;3. 对外贸易数据为各国货物与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

数据来源:作者依据世界银行WDI数据库中相关国家的数据计算而得。

大幅度提升,说明近几年我国大幅引进、学习、转化国外先进技术,逐步实现发展模式从“低端模仿”向“创新模仿”的转变^②。而对外专利授权收入也有长足进步,这为我国与沿线国家实现技术转移合作提供了强力支撑。

从上述几个方面来看,我国已经完全具备了成为双向“嵌套型”全球价值链分工新体系中核心枢纽的基础,这使得我国可以通过技术溢出、逆向跨国并购等方式从发达国家承接、吸收、转化、创新与扩散高新技术、新产品,继而又作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内前沿技术、高新产品的主导国通过区域产能合作、对外直接投资等途径合理安排区域分工与利益分配,带动沿线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对区域内协同发展的积极诉求

截至目前“一带一路”建设共涉及65个沿线国家,基本涵盖了亚非所有发展中国家,覆盖总人口超过世界人口的60%,GDP总量约占全球的1/3,沿线区域资源禀赋丰裕,劳动力充足且成本低廉,发展潜力巨大。仅从贸易与投资方面来看,根据图2的计算结果可知近十年“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在贸易与投资方面的增速大大超过以发达国家为主的跨大西洋贸易区域。在2006年至2014年期间,“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贸易与投资增速分别为10.6%^③和7.6%,而同期跨大西洋贸易区域的贸易与投资增速仅分别为4.5%和-2.5%。即使是后危机时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表现仍明显好于跨大西洋贸易区域的国家。

在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余威不断、全球经济持续疲软的大背景下,成本和风险越来越成为发达国

随着近几年我国对外投资额的井喷式增长,目前中国的对外投资规模已经超越招商引资规模,开始成为资本的净输出国^①,具备了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为我国实现有序产能合作转移奠定了根基。

4. 技术创新

以我国的专利收支情况为例,我国专利支出占比有较大

① 详见 <http://www.mofcom.gov.cn>。

② 陈凤仙和王琛伟^[10]的研究指出我国目前已经进入“创造性模仿”阶段。

③ 作者依据相关数据测算而得,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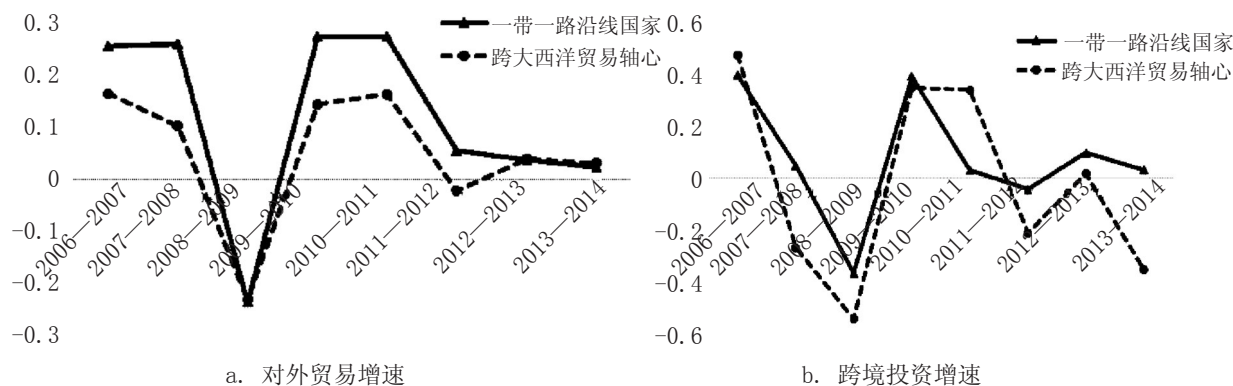


图2 贸易与投资增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部分贸易区域的对比

注：1. 所有计算结果的原始数据均以当年美元价计；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以包括中国在内的65个沿线国家数据加总而得；3. 参照李丹和崔日明^[11]的研究，以大西洋贸易轴心（包括美国、加拿大和欧盟15国，由于希腊数据存在缺失予以剔除）作为对照；4. 对外贸易为各国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进出口总额；5. 跨境投资为各国FDI流入与流出量之和。

数据来源：作者依据世界银行WDI数据库中相关国家的数据计算而得。

家跨国公司进行海外区位投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首要考虑因素，因此新形势下全球价值链演进的一大趋势就是基于低生产成本考虑而盛行的离岸外包方式将逐渐被基于低运输成本考虑的近岸外包方式^{[12][13]}所替代，即过去更受欧美大型跨国公司青睐的亚洲代工区，可能会让位给新进入的拉美国家，因此长远来看部分亚太代工区的国家可能会被挤出有全球分工体系。如前所述，由于地理位置、基础设施、政策环境等因素的限制，部分沿线发展中国家被天然排除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之外。以基础设施为优先建设领域的“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为沿线国家搭建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础，这些区域通常不是美日跨国企业愿意进入的投资领域，且基础设施也不是美日等国经济输入的主要方式^[4]。同时沿线发展中国家大多处于工业化初中期阶段，要素资源丰富而技术资金短缺，吸引外资、争取外援、参与区域分工以谋求经济发展的意愿强烈；而另一部分相对较发达的沿线国家或正受到西方的经济制裁（如俄罗斯），或在欧盟中影响力长期较低（如中东欧地区），导致这些国家/区域亟需寻求新的对外经贸合作伙伴。“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离中国较近的天然地理位置优势、贸易产品和资源禀赋方面存在的较大互补关系^{[14][15]}、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导致的区域经济地理重构以及自贸区/跨境电商平台兴起引致的贸易模式革新等将使更多沿线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国际分工中来，通过发挥贸易投资的倍增效应实现经济发展的共赢。正如Draper(2013)^[16]所指出的，对于全球市场参与度较小且具有许多小规模生产商的国家，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可能是其达到国际认可的生产效率和质量水平的一个跳板。

（三）对现有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创新

1. 嵌套型的分工结构

不同于当今全球价值链体系所呈现出的高端产品生产分工在发达国家内部循环、低端产品生产分工在欠发达国家内部循环的双闭环结构，新型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存在一个核心枢纽环节，该环节能通过衔接高低端产业链联通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在多领域的合作与竞争渠道，形成相对复杂的“嵌套型”分工结构，不仅能提升后发国分工地位与经济增速，也有助于分散可能的外部冲击。

2. 双向型的运行机制

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作为当今全球价值链的主导，主要通过链条控制实现对以低廉要素成本优势嵌入价值链的后发国的“俘获式锁定”，使后发国很难提升自身分工地位，本质上是单向控制型关系。而在新型分工体系中，由于和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存在双向需求关系，核心枢纽国中国通过衔接全球价值链与区域价值链，为沿线各国与发达经济体开展公平对话与经济合作提供平台与基础，在带动区

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同时,最终实现对现有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制衡与补充。

3. 包容型的服务对象

如前所述,当今全球价值链主要从发达国家的根本需求出发,且受限于地理位置、人为因素和政治制度的影响,很多发展中国家长期被发达国家排除在全球价值链之外或参与程度很低^[17]。而新型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则以沿线后进国家的发展诉求为主要出发点,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将亚、欧、非中部分长期被排除在现今国际分工体系外的发展中国家纳入全球分工体系中,以“互利共赢”为宗旨共同打造跨区域整合的新国际分工框架,共享全球化红利。

4. 均衡型的竞争模式

在全球分工背景下,跨国公司通过对价值链的控制形成了链条(发达国家)对环节(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模式,先天的竞争劣势^①导致发展中国家难以提升自身的国际分工地位。而新型国际分工体系将逐步转变“链条对环节”为“链条对链条”的竞争模式,为我国与沿线发展中国家实现自身经济发展和提升国际分工地位提供前提条件。

三、新型分工体系提升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路径分析

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一国要想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地位的提升,构建自身主导的价值链是避免陷入“嵌入式困境”、有效提升自身分工地位的重要途径,这将分别从环节专精、链条广延和网络纵深这“环”、“链”、“网”三个层次提升我国的国际分工地位。

(一)价值环节的专精化

价值链上各环节的专精化可定义为根据自身所具备的核心技术资源专注于部分特定环节^②来获取更高的产品附加值。这主要包括流程升级和要素升级两方面的内容。流程升级是指通过采用先进技术或重组生产系统来提升某一分工环节的生产效率。日本制造业的“倒微笑曲线”凸显出较高的工艺水平同样能使低端的制造组装环节具有较高的附加值(见图3)。在“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体系内,存在部分发达经济体(中东欧各国)以及技术领先型经济体(如新加坡),因此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我国可以通过加大与这些经济体在制造工艺、技术等方面的交流合作以及深化知识产权贸易往来来提升自身的工艺生产水平。要素升级同样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要素使用的高端化,二是要素成本的缩减化。在“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分工体系中,我国企业可以通过“差异化”对外投资策略,即通过投资区域内技术前沿型经济体获取高端投入要素、通过投资区域内资源型以及低劳动力成本型经济体获取低成本投入要素来实现要素升级,提升各环节生产效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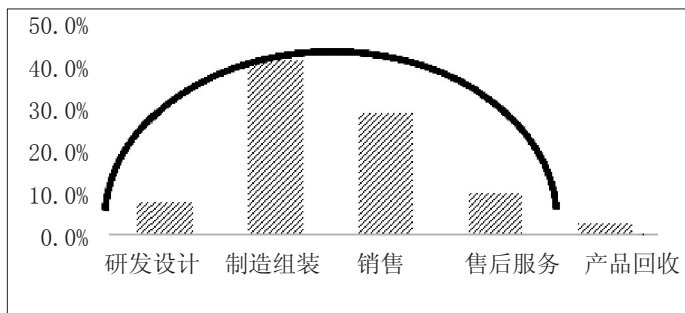


图3 日本制造业的“倒微笑曲线”

注:实柱表示制造企业各环节利润率。

资料来源:日本《2006年版制造业白皮书》。

(二)价值链条的广延化

价值链条的广延化可以定义为价值链长度的延伸,或是向高附加值环节的攀升。在现今全球价值

①这是一种单一资源对全球资源的竞争劣势。

②这里的特定环节并非完全指代高附加值环节。长远来看一味摒弃低端产业,环节会使一国经济存在较大风险。西方发达国家在危机后所显露出的制造业“哑铃化”结构问题就是最好的佐证。而王茜^[18]、索姆和伊娃柯娜尔^[19]以日本和德国两大制造业强国为例指出低端产业在经济发展中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链分工体系中,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资源禀赋等优势以及“引进来”战略的支撑,形成了“两头在外”的外贸模式。但是这种贸易模式因其在国内的循环链条和运行环节短而导致迂回程度低^[20],压缩了国内产业链在空间上延伸的可能性,也降低了产业的增值程度。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贸易模式创新(与沿线各国共建各类自贸区与跨境电商平台),能够有效降低区域内各成员国间贸易投资壁垒以及国际市场的进入门槛,以此引致的竞争与市场规模扩大效应能倒逼我国企业提升技术水平与产品质量,实现向价值链前段(即服务端)的攀升。同时,作为新型分工体系中的核心枢纽,我国一方面可通过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区域内部分具有领先技术的沿线国家展开大量中间品贸易合作,通过学习转化中间品的技术溢出,生产中间进口品的变异品,增加产品种类,获得动态的贸易利得^[21];另一方面企业还可通过海外投资,即通过相对低端的逆向跨国并购以及相对高端的沿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收缩开拓^①来实现向价值链后端(即研发端)的攀升。

(三)价值网络的纵深化

相较于前两类提升模式,价值网络的升级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狭义上的全球价值链指某一产品的全球生产分工过程,由于贸易产品的多样化以及同一产品存在同类不同质的现象,导致全球存在无数价值链条,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作为不同链条上的系统集成者,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空间布局使得不同链条相互交织嵌套形成价值网(亦称全球生产网络),发展中国家因此被分割而处于价值链上的孤立环节。中国要想实现价值链地位的跨越式提升,基于自身优势与发达经济体争夺全球价值链网络的发展主导权是有效途径。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一国的要素禀赋并非先天决定,而是可以主动调整的。投资可以带来规模经济,进而带来产业的集聚,而当产业集聚达到一定规模就能产生规模效益递增,使非先进的技术也能带来价值的增值,最终通过生产改变业已存在的禀赋条件。中国同绝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样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相当高的离散性,收入水平的差异使各国人民对产品需求层次的差别也大,低附加值产品价值链仍能创造价值,因此我国应在共存的高低位价值链条中保持活跃。同时,对于不同位势的价值链,其自身的分工效率及收益分配机制的合理性亦十分重要。这就要求我国基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与沿线各国在资源禀赋上的互补性,通过嵌入大量不同种类、档次产品的价值网络实现规模效应与效率提升,获取价值链的发展主导权。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建设为我国在新时期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拓宽了思路指明了新的方向。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我国可以构建以自身为核心枢纽的双向“嵌套型”全球价值链分工新体系,在实现国际分工地位跃升的同时带动沿线各国的经济发展。研究表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上与中国的互相需求及沿线各国对区域内协同发展的迫切诉求使通过“一带一路”区域产能合作形成双向“嵌套型”价值环流、重塑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成为可能。基于近十年来我国在经济总量、对外贸易与投资以及技术创新等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我国完全具备成为新型全球分工体系中核心枢纽环节的能力。虽然新型分工体系在结构体系、运行机制、服务对象和竞争模式等四大方面区别于现有全球价值链,但双向需求下的“嵌套型”架构使两者本质上既相互制衡又互为补充。最后文章认为新型分工体系可通过环节专精、链条广延和网络纵深三个层次来提升我国的国际分工地位。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深入,应加快落实国际产能合作的相关

^①这可以通过联想集团收购IBM个人电脑部门为例来加以说明:联想通过收购获得了高端研发能力和ThinkPad品牌,提升了自身的市场占有率和利润水平,使联想从个人电脑经销商升级为技术服务供应商;而IBM通过出售当前在价值链上获利能力较低的个人电脑部门而集中资源于利润更高的环节(如大型服务器、企业应用解决方案等)以期获取更高的市场回报率,这是一种较为高端的升级路径。

配套政策与措施,引导产业(区段)有序转移,形成合理产业分工体系,同时应将已有合作机制向各沿线国家倾斜,加快构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并以此整体嵌入全球价值链。同时作为双向“嵌套型”全球价值链分工新体系中的枢纽和核心,我国在新时期肩负着衔接“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作用,这就要求我国加大研发投入、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倒逼创新发展,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与跨国并购制度,切实引导技术进步,实现经济繁荣稳定增长。

参考文献:

- [1]王直,魏尚进,祝坤福.总贸易核算法:官方贸易统计与全球价值链的度量[J].中国社会科学,2015,(9):108-127.
- [2]张慧明,蔡银寅.中国制造业如何走出“低端锁定”——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15,(1):52-65.
- [3]储殷,高远.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定位的三个问题[J].国际经济评论,2015,(2):90-99.
- [4]卢锋,李昕,李双双,姜志霄,张杰平,杨业伟.为什么是中国?——“一带一路”的经济逻辑[J].国际经济评论,2015,(3):9-34.
- [5]刘友金,胡黎明.产品内分工、价值链重组与产业转移——兼论产业转移过程中的大国战略[J].中国软科学,2011,(3):149-159.
- [6]POMFRET R., SOURDIN P..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Connectivity in Developing Asia——with Application to the Central and West Asian Region[R].ADB Working Paper, 2014, (142).
- [7]OECD. Cardiac Arrest or Dizzy Spell: Why is World Trade So Weak and What Can Policy Do About It[R]. OECD Economic Policy Paper, 2016, (18).
- [8]张良悦,刘东.“一带一路”与中国经济发展[J].经济学家,2015,(11):51-58.
- [9]魏浩.中国进口商品的国别结构及相互依赖程度研究[J].财贸经济,2014,(4):69-81.
- [10]陈凤仙,王琛伟.从模仿到创新——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最优知识产权保护[J].财贸经济,2015,(1):143-156.
- [11]李丹,崔日明.“一带一路”战略与全球经贸格局重构[J].经济学家,2015,(8):62-70.
- [12]王中美.全球价值链的新趋势、新平衡和关键命题[J].国际经贸探索,2012,(6):105-114.
- [13]刘中伟.东亚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整合与东亚区域合作的新走向[J].亚太经济,2014,(4):126-160.
- [14]桑百川,杨立卓.拓展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关系——基于竞争性与互补性研究[J].经济问题,2015,(8):1-5.
- [15]杜秀红.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关系及政策建议[J].现代管理科学,2016,(5):85-87.
- [16]DRAPER P.The Shifting Geography of Global Value Chains: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rade Policy, and the G20[J].Global Summitry Journal, 2013, 1(3): 1-9.
- [17]赵江林.大区域价值链:构筑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同利益基础与政策方向[J].人文学刊,2016,(5):21-28.
- [18]王茜.中国制造业是否应向“微笑曲线”两端攀爬——基于与制造业传统强国的比较分析[J].财贸经济,2013,(8):98-104.
- [19]奥利弗·索姆,伊娃柯娜尔.德国制造业创新之谜——传统企业如何以研发创新塑造持续竞争力[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20]陈爱贞,刘志彪.自贸区:中国开放型经济“第二季”[J].学术月刊,2014,(1):20-28.
- [21]刘仕国,吴海英,马涛,张磊,彭莉,于建勋.利用全球价值链促进产业升级[J].国际经济评论,2015,(1):64-84.

(收稿日期:2016—10—30 责任编辑:杨锦英)